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通州区卷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李向振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中国民俗文化志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通过对现实传承和遗存的民俗开展抢救性的普查，书写所有县、区一级的地方民俗文化志，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关系的基础上，写出在文化巨变时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式地方民俗文化志，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之旅。

本志书的统一书写模式称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是为了从整体上突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化特征，理解地方民众的表达习惯。

希望这套规模宏大的志书，有助于留住和保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根基。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that, the local folklore cultural annals of all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hina are written, acting in un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through developing rescue investigations on folklore items circulating contemporarily and handing down by history.

It is a profound spiritual travel that, on the bas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folklore and local life, we any write a new type of local folklore annals which expres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t the age of rapid cultural changes.

The written mode of this set of annals is called "folklore annals commanded by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items", so as to display features of local folklore, reveal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stand local people's customs of expression.

We hope this set of annals broad in scale, are helpful to preserve and maintain our cultural bases, o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relies to develop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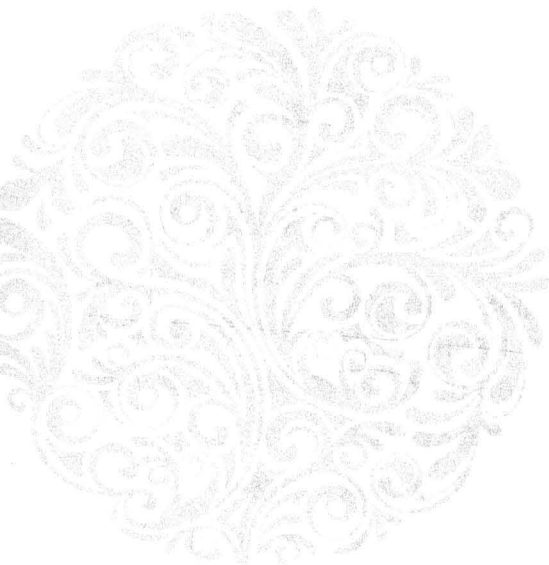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通州区卷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李向振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 通州区卷 / 刘铁梁主编 ;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200 - 12761 - 4

I. ①中… II. ①刘… ②北… III. ①风俗习惯史—
中国②风俗习惯史—通州区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006 号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通州区卷

ZHONGGUO MINSU WENHUA ZHI

BEIJING · TONGZHOU QU JUAN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李向振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0.25 印张 474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761 - 4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市系列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 强

副主任 杜德久 刘铁梁 刘一达 包世轩 刘绍振 崔 陟 哈亦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杰文 尹钧科 白 杰 白鹤群 史燕明 包世轩 刘一达

刘绍振 刘铁梁 杜德久 岳永逸 赵世瑜 哈亦琦 郝志群

高 巍 崔 陟 崔普权 康 丽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通州卷》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铁梁 杜德久

副主任: 李向振 王琦茜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素珍 王琦茜 王 颖 韦 文 白 鸽 刘铁梁

孙艳艳 杜德久 杨兰英 李向振 李秋侠 陈汝静

郑 玮 章 奕 路 瑞 窦玉平 蔡文娇 戴立军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北京市系列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批准号 05BSH030
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民俗普查”项目

编辑单位：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
北京市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各章作者

第一章·····	刘铁梁 李向振
第二章·····	王素珍
第三章·····	李向振
第四章·····	陈汝静
第五章·····	白 鸽
第六章·····	郑 玮
第七章·····	王 颖
第八章·····	孙艳艳
第九章·····	韦 文
第十章·····	路 瑞
第十一章·····	覃 奕
第十二章·····	蔡文娇 李秋侠
第十三章·····	李秋侠 蔡文娇
图片资料表·····	李向振



总序



一

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既形态各异、风格多样，又相互交融、和谐，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基本表现。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一方面，一些民俗文化正面临破碎和流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的民俗文化得以重构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因此，想方设法地保留、记住和重新认知民俗文化，重温这种文化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成为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民俗文化志》的书写被提上日程。具体来说，这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任务是以县、区为地域单位，对全国的民俗文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和全面的记述。计划出版近 3000 卷。

21 世纪初，在冯骥才等有识之士倡议之下，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目的是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著述、出版等项目，积极影响和推动全社会都来抢救、保护各民族民间文化。从全局来看，我国政府为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履行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近年来正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组从2003年10月开始,首先在思路创新和方案设计上进行酝酿,并以北京市为实验地区,编写了《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和北京城区、农村两部分民俗调查纲目。从2004年5月起,进行了调查研究的试点和样卷本的写作,经一年时间写成《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随着这一样卷和其他几卷志书的先行出版,整个项目进入逐步推广阶段。《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全部完成尚需要时日,更需要所有参加者的不懈奋斗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

一

中国从先秦以来,历代都有对于民俗的文献记载。《诗经》作为周代采诗制度下的成果,最早记录了民歌和宫廷的歌声,表明当时存在着“风”与“雅”“颂”即对应于“俗”与“礼”的分野,书中的十五国风又体现出民俗的地域差别。《山海经》的叙述文字中,充满了对于四方风物、远地异民的想象,包含了地理、物产、神话等多方面的上古民俗知识。在诸子、史家的著作中,风俗民情被当作政论引述的事例和解释的对象。东汉时应劭《风俗通义》和王充《论衡》,或主张“辩风正俗”,或提倡经验理性,都是面对一定民俗现象进行论辩的专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私家著述风起,出现多种形式记述民俗的书籍,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长久影响。主要可归为三类:一是地理类,如晋代周处《风土记》、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感同身受地记述了地方的生活习俗,开创了书写一地域民俗的先例。二是作为“史之余”的博物、述异、志怪类,如晋代干宝《搜神记》、梁代任昉《述异记》及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等,记有大量口头故事和风物知识。三是描述都城繁华、市井风俗类,如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等。此外,还有对于域外民俗的记载,例如较早出现的晋代陈寿《三国志·魏志》,及后来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

明、清两代，文人笔记几度时兴，其中如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所载奇闻逸事，多反映民众与士人的心理。屈大均撰《广东新语》，所记岭南民俗非常丰富，自认为是《广东通志》之“外志”。另一方面，全国各个府、县普遍纂修方志，在所列“风俗”篇中均注意记录本地的岁时、礼仪等民俗事象。

自古以来有关民俗事象的文字记载，成为今人认识社会生活历史流变的宝贵资料，也包含了书写民俗的丰富经验。但也应该看到，古代文人对于民俗的记录大多是被纳入驳杂的见闻当中，基本上缺乏独立、系统的著述。从所表达的价值观来看，尽管曾有称民间歌谣为“天籁之声”或“真诗”的感慨，却不可能彻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此种局面至民国期间发生大变。以20世纪20年代的歌谣学运动为标志，民俗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站在理解民众的历史与文化创造的立场，开展民俗资料征集及调查研究活动，推出《歌谣》《民俗》等专门刊物，出版许多民间文学、民俗资料集和研究论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始才出现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等民俗志专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志的书写进入高潮。除了在新修地方志当中一般都有民俗志的专卷或专篇，还涌现出以省、市、县、乡、村为单位的一批地方民俗志，更出现以省为分卷的陶立璠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段宝林主编《中华民俗大典》和以事象类别为分卷的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都体现出在社会变革时期发展中国民俗学的责任意识。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书写所有县、区一级的地方民俗文化志，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换言之，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抢救性的民俗普查，在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关系的基础上，写出在文化巨变时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式地方民俗志。

三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书写，需要借力于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有众多文化学者和广大群众的参与与支持。反过来说，志书的书写又将促进文化学者与广大群众的密切交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挥积极作用。志书以民俗普查为写作基础，不仅是为了获得真实、丰满的民俗资料，而且是为了掌握当前民俗文化遗产的状况和理解民俗文化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调查研究的结果必有助于对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正确的识别、定性和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主要是在文化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遗产”一词连用，主要是政府在建立文化保护制度，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义务的工作文件中所使用的概念。三者所指，虽有一定差别却是基本重合的文化现象。在保护工作中，实际的做法是首先将民俗文化事象划分为口头传统、艺术、节庆、知识、手工技艺等类别，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这在操作上是必要的，但是在认识上容易发生孤立看待民俗事象的倾向。民俗，作为人们所创造、传承和运用的生活文化传统，固然表现为多种多样的事象，但是在一定社会中，这些事象却构成了整体的文化模式与象征系统。一般的民俗调查都要结合地方民众的生活，发现民俗事象之间的相互关联，理解各种民俗事象的象征含义。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而言，本志书的价值不只是提供表面的民俗知识，而且是引导读者联系中国国情特别是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具体和深入地解读民俗文化的意义。

四

面对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当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调查和书写，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认识问题：

（一）民俗的地方性问题

民俗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民族统一性的特征；同时，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民俗都存在和传承于一定的地域社会，因而具有地域性特征。中国民俗文化呈现出“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面貌，是民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交叉的表现，总括起来就是中国民俗地方性的表现。根据这一认识，《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将以地方性为着眼点，结合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

生活的历史，记述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的民俗。作为具有时空背景的民俗志，应当在描述中体现出当地人群的地方认同感，反映出当地独特的历史进程。

任何地域社会都不是封闭和独立的存在，所有的地方文化都经历过复杂的交融与分化的过程，因此在实际调查和写作中，就不能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封闭地理解民俗的地方性，应当根据本地方民众与外面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全面解释民俗文化地域与群体的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

本志书的各个分卷是以县、区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尽管不可能与民俗实际分布的地域完全对应，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也考虑到操作的便利和配合地方政府保护民俗文化的工作，这种选择却是比较适当的。

（二）民俗文化留存状态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实地调查中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有四种留存：一是在生活中已经消亡，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之中的民俗；二是从生活中刚刚淡出，仍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民俗；三是在生活中被人们传承、享用或者有所调整的活态民俗；四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而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民俗。第一种留存状态的民俗，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我们普查和书写的重点。第二和第三种留存状态的民俗才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我们对第四种民俗格外加以注重，因为它们反映了民俗文化具有创造性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每一次民俗调查都是对当时、当地民俗现实的存在状态进行记录，民俗志应该综合这些记录，描述出包括记忆和被再创造出来的生活中的全部民俗现象，而不应该是对以往文献资料的辑佚和复述。

一些民俗即使已经发生改变甚或残缺，但是仍然作为人们的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比如一些节日、礼仪、饮食习惯、民居、器具等。另一些民俗，即使可以因被生动地展示而似乎得到保留，但是已离开了原来的主人，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利用，成了旅游观光业的节目。从传承的性质来看，前者具有连续性，后者具有非连续性。民俗志应当记述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样做才能准确认知民俗文化本来的面貌和性质。

（三）民俗事象与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姿多彩



的地方传统生活方式，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生态。民俗文化作为人们在生活中的创造，任何一种事象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所以，只有结合对于地方生活方式的理解，才能发现民俗事象在一个整体文化网络中的相互联系，才能具体了解民俗事象的丰富意义。

各个地方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没有绝对的边界，彼此之间只有相对的区别。同样，民俗事象也是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中传播，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性，并非纯粹属于哪一个地方社会。但是，地方民俗志却应重点描述民俗事象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形态与相互联系，而不应过分强调民俗事象的标准形态以及抽象的文化意义，更不能用其他地方的调查材料来代替本地的事实。

民俗作为人们的语言、知识、行为、工具和技能等生活传承，同时也在整体地表达民众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理解民众的这种自我表达，应成为书写当代地方民俗志的重要问题意识。为此，有必要充分重视民俗事象之间自在的关联，发现民俗事象可能互相解释的意义，或者说，有必要将地方民俗文化视为一个内含多种文本和语境关系的系统。

此外，地方民俗志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地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应给予一定交代。这不仅有利于说明民俗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利于寻求历史连续性的表现。最新的调查经验表明，地方民俗文化传统并非全盘崩溃，相反，依然是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基础。一个地方社会的地理条件，还有人们的性格、交往习惯和知识、技能等都成为发展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深层的民俗文化遗产现象应当给予密切关注。总之，结合对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把握，将比较容易描述地方民俗的特色，呈现民俗文化深刻的逻辑关系，反映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特征。

五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统一采取的书写模式，是“标志性文化统领式”。

所谓标志性文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的概括，也就是从

生活文化中筛选出来的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征、包含丰富与深刻意义的事象本身。它一般是不同程度地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代表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二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三是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可以有形的建筑、器物，包括作为一方水土一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比如长城、大运河，北京城里的四合院，草原上的羊群、马头琴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创作、仪式、表演、技艺。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史诗，壮族的歌圩，南方村落的雉仪，陕北妇女的剪纸等。这些文化事象都从某一方面符合标志性文化的条件，而且是一地域社会或群体所认同的重要文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在一个地方也不是只有一个，凡能够比较集中反映地方社会关系、秩序和具有丰富内涵的事象或符号，都从不同侧面或在不同层次上具有标志性文化的性质。标志性文化并不等于都是宏大的事象，某些事象看似细小却由于折射出地方历史，承载着多重特殊的意涵与浓厚的乡情，也可能成为标志性文化现象。例如，在北京门头沟区山区，在娶亲那一天，宾客们一定分食一种掺进大量“盐分”的“缘分饼”，这个习俗与其他习俗的意义相关，包含对于先辈们来此边关与古商道上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总之，我们理解的标志性文化，是体现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的若干重要文化事象。

标志性文化的概念，首先是在当前各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的，但对于我们写作地方民俗志却具有非常现实的工具性意义。现在所看到的民俗志，多数是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划分法来记述民俗，可以称为文化类别与事象结合的书写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重视对于民俗事象的分项记述和时空传播变化的认识，但也比较忽略各种民俗事象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让人感觉容易将民俗事象从具体生活中抽离出来，影响了对于民俗意义的具体解读。相比而言，采用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是力图抓住重要的



民俗事象，并且带起与之相关的其他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记述。尽管可能做不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记述，却能够凸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化特征、理解地方民众的表达习惯。

事实上，这种类似的追求，已在一部分地方民俗志中有所表现，特别是在一些个案民俗调查报告中成为写作模式。在人类学界，现代民族志 (ethnography) 的写作更多采用类似形式，例如早在 1922 年，马凌诺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发表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集中考察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一种称之为库拉 (Kula) 的特别的交换制度。这一交换制度，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风俗信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反映出当地社会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库拉就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标志性文化。以后这种写作模式的著作不绝如缕，直至今天。不过，地方民俗志毕竟与民俗学的个案调查报告和人类学的著作有所不同，它不便采取仅透过某一种文化现象而审视整体文化类型的做法，还要兼顾对于地方社会民俗文化的多点透视。

六

只有重视过程，才能得到结果。在制订调查方案之前，有必要对以前所掌握的资料给予充分整理，并根据本志书关于调查质量和书写模式创新的要求加以检讨。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既要结合民俗分类的提纲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访谈，也要从纷繁复杂的民俗现象中逐步认知当地的标志性文化，也就是要发现有哪些文化是当地人所特别重视和讲究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定的问题意识对于调查来说是必要的，但也要避免主观先行的弊端，因此可采取分阶段几次下去调查的方式，以便随时总结经验，根据民俗文化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自身的理解，及时地调整调查的重点和方向。

民俗志虽然不能用议论来代替叙述，但精心安排的叙述却可能表达出对于民俗的深刻理解。“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就是一种突出地方文化特征，体现地方文化自觉的民俗志。为此，在书写方面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每一章和节的标题，包括它下面的第三级标题，都最好围绕标志性文化来

设置；二是文字的叙述应做到主次分明，用标志性文化事象来统领相关的民俗事象，以体现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和象征意义；三是应尽可能使用鲜活的民俗语汇，最好结合集体生活事件和个人经历的叙述等个案材料，对重要民俗事象进行深入的叙述，做到既能见事又能见人。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要求在调查质量和书写模式的创新方面都能够达到新的水准。为此，一般应该由高校、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和当地民俗学者联合组成队伍，一起进行调查、讨论和写作。当地民俗学者不仅熟悉家乡生活，也熟悉家乡人的语言，是书写新式民俗志的主力。而专业人员可以更多发挥分析、思考和善于发现新鲜事物的特长。双方人员互相取长补短，将有助于避免重走老路，加深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实现书写新式地方民俗志的目的。

希望这套规模宏大的志书，能够有助于留住和养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根基。

刘铁梁

2006年8月

2015年8月修订



序 言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通州区卷》是继《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等之后的又一本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为指导思想的民俗文化志。不同于北京市的其他各区县，通州区是位于北京市东南部的远郊区，与市中心相距较远，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因此，通州区及其民俗文化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城中心的人来说，比较陌生。对于我们来说，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理念来书写通州区的民俗文化志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书写民俗文化志之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熟悉通州区的历史和文化，然后在熟悉了解的基础上确定通州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这是我们前期调查工作的重点。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通州区卷》的实地调查工作于2012年4月正式展开。在此之前，我们组织编写人员大量地阅读了《通州县志》《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通州卷）》等与北京文化、通州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与这些文献资料不同，我们此次调查所关注的重点是作为普通人的通州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普通历史文化传统的通州文化。

在初步了解的基础上，编写人员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到通州区的各乡镇进行田野作业，实地了解通州各乡镇的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

我们组织北京市民俗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与通州文委、文联的学者，以及各乡镇文化干部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进一步明确了调查的重点。2012年6月，我们开始了集中调查，编写人员深入通州区的田间地头与通州区地方知识丰富的老者进行访谈，开展讨论，深入体验通州人民的日常生活。通州地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通州地区的民俗文化事象兼收并蓄，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全体编写人员在各自调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初步确定了此次编写的提纲，力图较为准确地把握、标定通州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经过大量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选取了运河号子、四大街、潞河中学、贾后疃天主教、兴各庄吹鼓手、武辛庄村风车王、“六月六，看谷秀”、叠亡疏、熬硝营、郭村“蹦蹦戏”、“金三角”等作为我们调查的重点。通州地区民俗文化事象众多，我们所选取的这些标志性文化是为大多数通州区民众和本土学者所看重的，它们更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这些调查点所标志的民俗文化事象，基本上反映了通州所在地区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通州人民对于北京文化、民族文化特殊的贡献；这些民俗文化事象本身内涵丰富，深刻地联系着通州地区历史上和现在民众的生活方式，牵连众多的其他文化事象。因此，我们选取这些地方作为调查的重点，并希望通过对这些调查点的深入调查，获得对通州人民生活状态的深度把握。

我们此次调查的主体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人类学专业的师生。他们大多数不是北京人，对北京文化、通州文化没有系统的感性认知。通过大量阅读与北京文化、通州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在田野作业过程中与通州民众面对面的交流和访谈，我们试图逐步建立对通州民俗文化的直观认知，以至形成理性的把握。尽管如此，与那些长期从事通州民间文化研究的本地专家、学者相比，我们也只是从局外人的视角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也许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作为局外人，我们以一个外部人的眼光来观察通州的民俗文化，在文化的比较的视野中或许更能把握一些通州人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内涵。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力图以通州人的视角来认识通州区丰富的民俗文化事象，感悟通州人对自己民俗文化的体验，领略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在借鉴已有的文献资料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今天通州人



的口述历史与社会记忆。这些讲述行为本身就潜存着一种文化认知与评判，以及生活经验和知识的传承。而现代民俗文化的快速变异与断裂性的传承也使我们不得不倚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

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开始书写这部民俗文化志。由于是集体编写，各章节作者的行文风格，以及对通州民俗文化的认识不尽相同，本书力图贯彻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为指导思想，但是这同样仅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本书的写作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于我们将来的进一步修订。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通州人民的热情帮助，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民俗文化志就难以成稿。此外，我们还得到了通州区文联、通州区各级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支持！

刘铁梁

2016年9月





目 录



1	第一章 通州概况	
	第一节 通州区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沿革	3
	第二节 通州区的历史人文环境	6
	第三节 通州区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19
25	第二章 运河号子	
	第一节 水旱码头	27
	第二节 “通州霸”	45
	第三节 “号子人家”	57
73	第三章 郭村“蹦蹦戏”	
	第一节 蹦蹦戏“老戏骨”：杨永志	75
	第二节 杨连喜和连喜评剧社	83
93	第四章 四大街	
	第一节 漕运与通州	95
	第二节 闸桥	104



	第三节 “十八个半截胡同”	116
135	第五章 潞河中学与通州文人	
	第一节 通州文气	137
	第二节 通州文人	145
175	第六章 西集	
	第一节 “河里没鱼街上取”	177
	第二节 一京二卫三通州四西集	187
	第三节 老集市 新买卖	194
205	第七章 宋庄画家村	
	第一节 曾经的宋庄	207
	第二节 新老宅新商铺	215
	第三节 沾了艺术味儿的“土著”	229
239	第八章 贾后疃天主教	
	第一节 天主教的村落	241
	第二节 古道边上的召里观音寺	254
	第三节 兴各庄的吹鼓手	264
277	第九章 风车王	
	第一节 风吹风车转	279
	第二节 里二泗小车会	290
	第三节 木匠季连宝	304
315	第十章 “六月六，看谷秀”	
	第一节 “六月六，请姑姑”	317
	第二节 “水回回”	332



343	第十一章 叠亡疏	
	第一节 叠亡疏	345
	第二节 点主与堂祭	357
	第三节 姑奶奶“点笙钱”	363
	第四节 王山子	373
383	第十二章 熬硝营	
	第一节 “闺女不给熬硝营”	385
	第二节 晾鹰台上的德仁务	395
	第三节 半截河的老道会	402
413	第十三章 “金三角”	
	第一节 移动的“觅子店”	415
	第二节 “耕读传家”李辛庄	423
	第三节 徐官屯的路灯老会	434
	第四节 张庄的龙灯会	442
449	主要参考书目	
452	后 记	





第一章



通州概况

老北京有句古话，叫作“一京二卫三通州”，说的正是通州地区作为京畿门户的重要性。通州位于北京城正东，从通州区乘车到北京西站大约 26 千米，通州有首都的“东大门”之称，古人曾用“紫气东来”来形容它的地理位置，建镇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京郊交通、经济、文化重镇，同时也是兵家必争的“水上堡垒”。这里不仅是货物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文化的集散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的影响在通州文化里逐渐沉淀下



来，形成了富有当地地理人文特色的运河文化，千年以来源远流长，与宣武文化一同成为北京市并驾齐驱的两个重要文化圈。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昔日的繁荣，自清代后期，虽然漕运衰落，而且随着蒸汽机的出现，社会经济的变革，原来以水为载体的运输方式发生改变，运河失去了往日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而淡出历史舞台，但通州的运河文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当地的文人学者、艺人工匠是维持和宣传运河文化的强大动力。



第二章



运河号子

过去有句说法，叫作“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通州是水陆都会（水旱码头），物资交流与集散地。“通”“运”不仅指通州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特点，而且也是其文化上的特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商业、运输业、手工业等）丰富而庞杂。



第三章



郭村 『蹦蹦戏』

在通州地区马驹桥镇，每当提及郭村，许多人都会说起该村的“蹦蹦戏”。“唱蹦蹦儿的”俨然已经成为该村文化的代名词。走进郭村，村民也会热情地问道，“是不是来调查俺们村唱蹦蹦儿的？俺们村蹦蹦戏唱得棒着呢”。郭村村民在介绍该村的蹦蹦戏时，那份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十分感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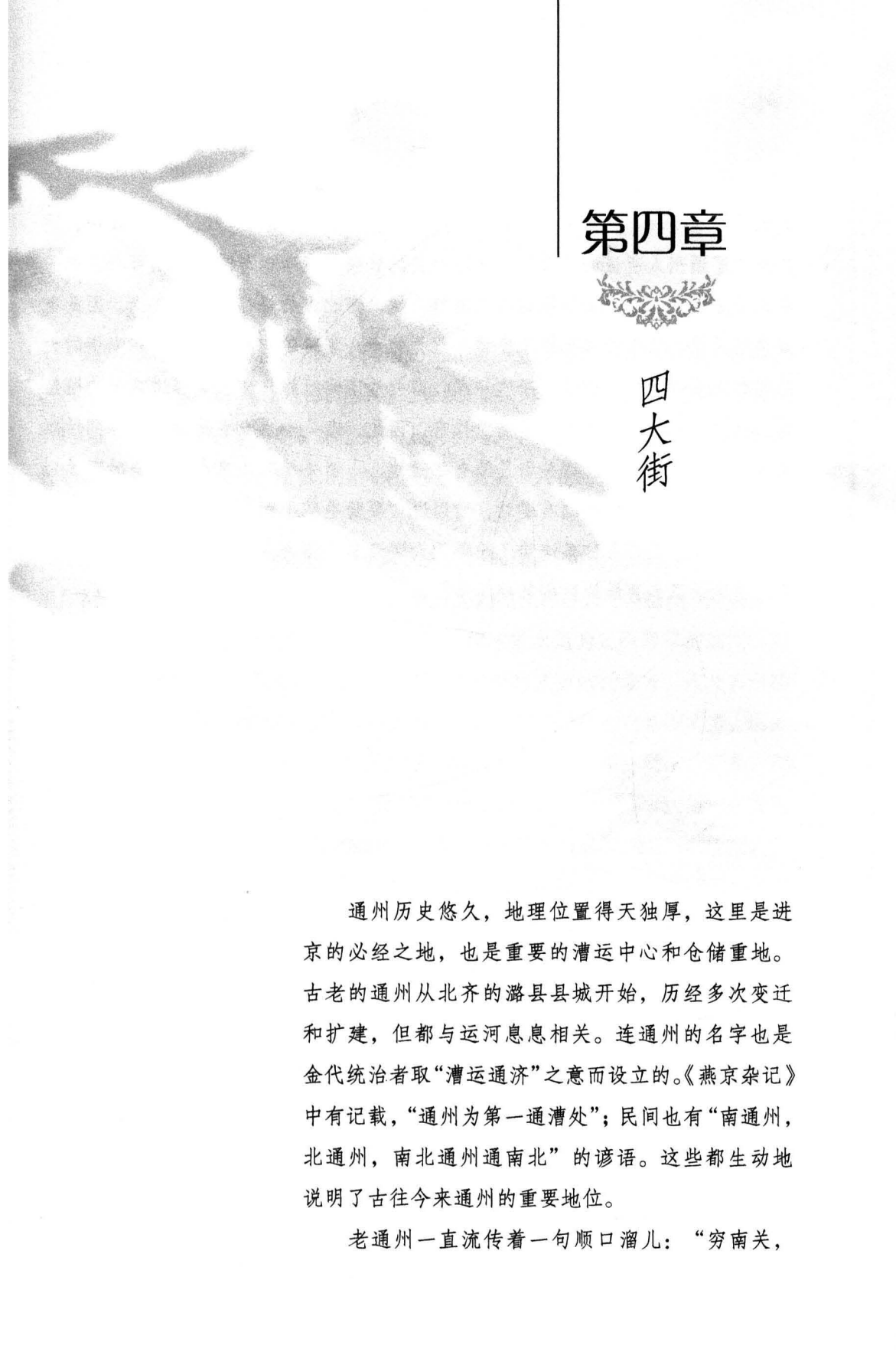
纵观郭村“蹦蹦戏”百年兴衰史，或许能够让我们从乡土艺术层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归根结底，乡土艺术的主体是土生

土长的村民，有了村民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有了乡土艺术的兴盛。所以，我们要了解乡土艺术，就必须了解承载这些艺术的村民。他们的生活史、他们讲述的记忆和历史，恰恰成为他们所传承艺术的最为真实的土壤。诚如郭于华所说：“人们记忆和讲述的历史，如同晦暗而浓厚的迷雾，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洞悉其中的历史真实存在，但若放弃穿透它的努力，便无从理解其包含的历史真意。”^①也许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通过村民的讲述来穿透这层“迷雾”。接下来，本文将通过两个人围绕着郭村“蹦蹦戏”的生活故事的讲述，来还原这一段来自民间的记忆和历史。



图 3-1 郭村门口的欧式牌楼（李向振摄）

① 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第四章



四大街

通州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里是进京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漕运中心和仓储重地。古老的通州从北齐的潞县县城开始，历经多次变迁和扩建，但都与运河息息相关。连通州的名字也是金代统治者取“漕运通济”之意而设立的。《燕京杂记》中有记载，“通州为第一通漕处”；民间也有“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谚语。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古往今来通州的重要地位。

老通州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穷南关，

富北关，吃喝玩乐在东关，要骑毛驴上西关。”在历次新城与旧城的变迁中，逐渐形成了通州人所说的“关”，而这四关的繁荣与衰落也与漕运密不可分。东关和北关分别是官运码头和民运码头的所在地，南北方物资都在这里交流，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服务设施和娱乐设施。北关的十八家骆驼店和茶局子，东大街的大店铺和大商铺林立，都说明了这一点。南关是南北行旅、文人墨客进京时的所经地，这里没有什么物资交流和商业往来，因此，南关十八个半截的大部分回民以卖苦力和小买卖为生。西关则是粮仓存储地，出西关就奔北京去了，当时西关到北京东直门、朝阳门间都有驴站，所以说“要骑毛驴上西关”。归根结底，通州城的繁荣和兴盛都与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息息相关，大运河记录着城市的历史，也记录了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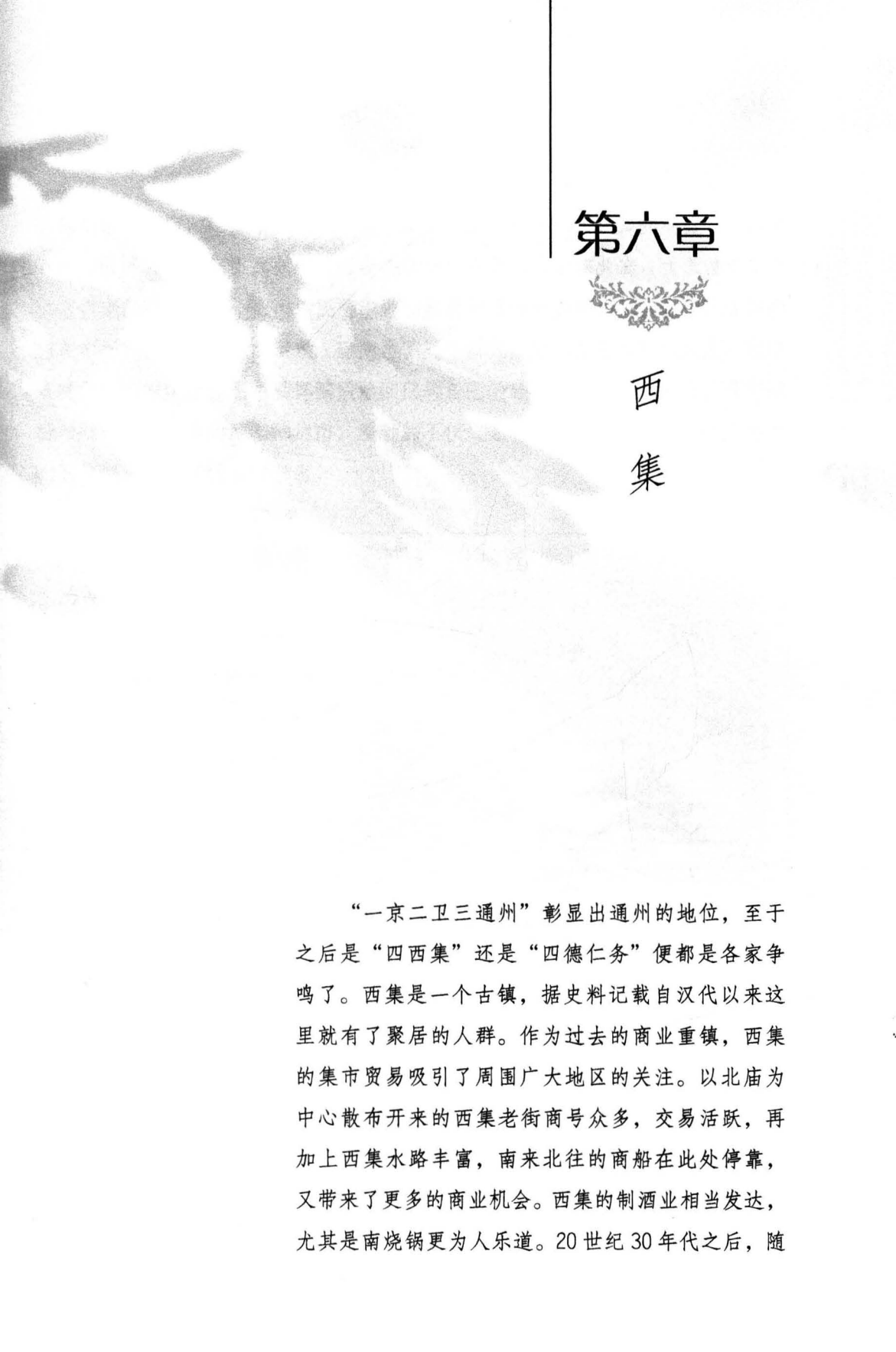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潞河中学与通州文人

运河襟带千里，通州因漕运而兴。三千里大运河运载的是漕粮和商货，流淌的却是凝重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经过南北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碰撞，积淀了内容丰富、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底蕴。如今的通州是全国文化模范县，被誉为中国“作家之乡”。从刘绍棠开始，通州区的文化名人多以运河文化为创作题材和汲取养分的源泉，情系家乡，这既是通州历史的见证，也是通州文化的魅力所在。



第六章



西 集

“一京二卫三通州”彰显出通州的地位，至于之后是“四西集”还是“四德仁务”便都是各家争鸣了。西集是一个古镇，据史料记载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有了聚居的人群。作为过去的商业重镇，西集的集市贸易吸引了周围广大地区的关注。以北庙为中心散布开来的西集老街商号众多，交易活跃，再加上西集水路丰富，南来北往的商船在此处停靠，又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西集的制酒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南烧锅更为入乐道。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随



着战争，西集贸易渐渐冷落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复苏起来的商贸又给西集增添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锻件行业的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生物制药、汽车制造等工业进一步展示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西集。





第七章



宋庄画家村

宋庄镇位于通州区北部，西边与朝阳区接壤，北边与顺义区为邻，地处东北及环渤海地区进京的交通要塞。宋庄镇在1994年以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镇落，有着这个地区独特的时代记忆和地区记忆。

“年年挖啊”说的是宋庄镇的村民在20世纪50年代时几乎年年去挖河道，挖的河道不仅是镇里的一些小的河道，还有其他区（县）大的河道。这些河道有如今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密云水库、怀柔水库，还有早已经停用的徐辛庄水库等，那时候全村壮年

一起出行挖河道的生活让村民更多地想起的是集体生活带来的整齐划一感和村落归属感；“外地女人过来多，本地女人往西走”说的是本地的姑娘倾向于嫁往西部的北京市区，而当地的小伙儿娶的媳妇中，也有非常多的人是来自外省（市），其中以山东和河北为主；宋庄镇的宋庄村曾经是当年平津战役的指挥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寺教师村的名声在解放时期就蜚声通州。

如今的宋庄因画家村而闻名中外，艺术家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宋庄镇的经济状况，甚至塑造了宋庄整个发展规划的独特性，增添了宋庄镇的文化气息，也书写了宋庄镇新的历史篇章。1993年之后形成的画家村以小堡村为主，相邻的村落如宋庄村、大兴庄村等也或多或少地分散有艺术界的不同群体。艺术家的集聚对当地村落最大的影响就是房屋功能的增添，过去的房子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如今的房屋除了百姓的居住外，更增添了出租这项重要的功能，几乎已经形成了家家有房出租的局面，房租也成为画家村村民一项普遍的经济来源。房屋功能的倾向性变迁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画家村的前世今生。就村民本身而言，除了房租带来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外，艺术氛围的熏陶导致村民的艺术涵养的提高更是其他乡镇无法比拟的。村民们积极利用画家村带来的艺术文化方面的优势，开始私人收藏艺术品、开文博馆，甚至自己创作艺术品，等等。另外，画家的到来不仅对村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画家群体的集聚效应对于来此作画的画家、来此经商的画商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经济收益的提高，画家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艺术机构的建设也逐步完善了起来。日新月异的画家村，似乎像新时代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奋力向前，用文化武装着自己，用艺术提高着自己，力争走在时代的前列。

第八章



贾后瞳天主教

按照区委总体工作部署，潞城镇于2001年由原胡各庄镇和甘棠镇合并而成。按照潞城镇档案材料记载，该镇域面积70.7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45000亩，总辖54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常住户数21342户，本地总户数18492户，常住人口64542人，户籍人口35868人；其中，镇农业人口27725人，非农业人口8143人，外来流动人员近3万人（在新城范围之内涉及25个村，辖区面积25.86平方千米，总户数10330户，人口18900人），伴随本镇经济和各

行业的发展，外来人口在不断增加^①。潞城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邻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东邻燕郊，北邻宋庄画家村，西邻万亩森林公园，交通四通八达，便于文化横向交流。镇域内有运河、潮白河、减河，三河环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酝酿出这一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本章以贾后疃天主教这一标志性文化现象统领或连带出其他村落的独特文化。首先对贾后疃的天主教信仰及天主教音乐会进行了描述；连带出作为运河边上的潞城镇中与运河有关的几个村子，并对每个村的独特文化进行介绍；继而介绍本镇的民间艺术，其中兴各庄的吹鼓手和东堡高跷与东堡老道是属于潞城镇的，但由于笔者与负责宋庄画家村调查的王颖协作调查，所以把属于宋庄镇的六合村空竹放在此处，作为民间艺术来共同展示民间艺人的智慧和生活。

①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档案编研材料之《行政村简介（1949—2007）》，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综合档案室，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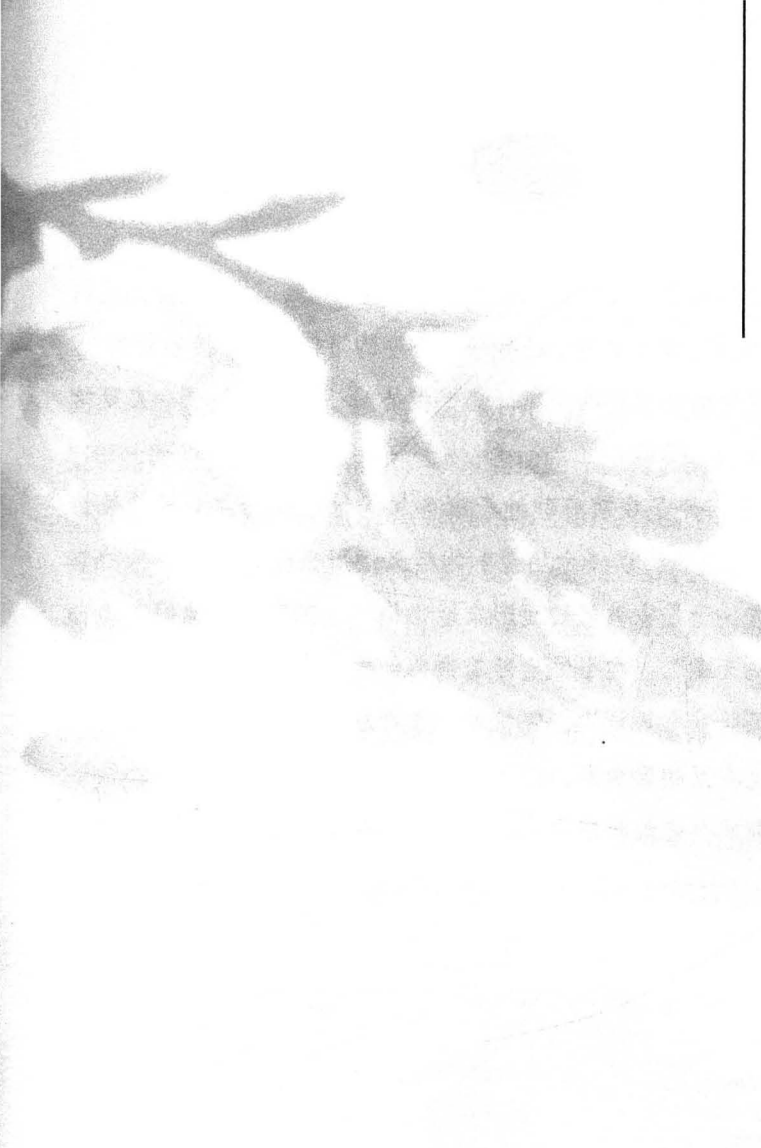
第九章



风车王

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昔日的繁荣，自清代后期，虽然漕运衰落，而且随着蒸汽机的出现，社会经济发生变革，原来以水为载体的运输方式发生了改变，运河失去了她往日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而淡出历史舞台。但是，通州的运河文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当地的文人学者、艺人工匠是维持和宣传运河文化的强大动力。一方面，像浩然、刘白羽、刘绍棠一类的文人作家在通州的运河文化熏陶下其人其作品被世人了解；另一方面，通州的

民间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当地政府对文化的重视逐渐被开发出来，如“风车大王”梁俊与“面人汤”等。然而，后者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地方能人，自身有着突出的手艺，同时他们也更加贴近生活。有的民间手工艺人靠着这门手艺生活了一辈子，如西集镇的“风车大王”梁俊，早时候靠着风车养家糊口，历尽生活艰辛，现在生活好过了，子女成家了，但是风车仍然作为其生活重要的经济来源和乐趣之源。相比之下，微缩建筑的大师季连宝则是以此为乐，钻研创新，将其所长发挥到极致。他做木匠不求财，就是爱好，他的手艺里不只有技术，更有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张家湾李二泗的韩德成则是以他对小车会的理解，号召爱好者共同参与，固定周五晚上练习，平时也参加一些表演。一方面丰富了百姓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得到了村民的肯定。在出名之前他们的爱好在各自的生活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在他们被人们所熟知之后，随之而来的有很多超越他们生活期待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己的兴趣也各有取舍，而我们更加担心的是这些民间能人精湛的技艺将在他们驾鹤西去之后不复存在，这既是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的担忧，同时也是最普通的人文关怀。他们都是镇上的名人，但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感觉他们首先是村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他们的身上除了有手工艺这在外人看来光芒四射的特长外，也有他们对生活艰辛的记忆。我们以他们的手工艺作品作为起点，走进他们更加真实的大众生活。



第十章



『六月六， 看谷秀』

在于家务回族乡的东马各庄村，每年除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全国性节日以外，还要过一个特殊的节日——六月六。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这一天炖上一大锅肉，摆一桌丰盛的宴席，还有新鲜的瓜果，饭后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娱活动，比如唱评戏、沙地摔跤等。传说这天是“冰雹老爷”的生日，给冰雹老爷过生日能保佑庄稼免受雹灾。于是，大概从1846年起，东马各庄村的人就在每年的六月初六给冰雹老爷烧香上供。这源于普通农民对于土地的眷

恋和对庄稼的美好祝愿，人们期盼着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六月六”除了炖肉、娱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接姑奶奶”。每家都在六月初五把出嫁的姑奶奶接回娘家，盛情招待。“六月六”节一直延续到现今。

距离东马各庄村1千米处是乡政府驻地于家务村，村中回民占全村总数的75%，他们恪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以《古兰经》的经义指引言行。由于特殊的饮食结构，有着喝茶的习惯，于是也被亲切而形象地称作“水回回”。他们在婚丧嫁娶的仪式后吃“清真八大碗”，在个体生活工作条件的允许下严格把斋。村里在抗日战争期间组起回民队，奋勇抗战，保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随着回汉之间来往的频繁，两族之间也在互相影响着，回汉之间逐渐开始通婚，经济条件富裕的回族家庭在汉族春节期间也燃放起鞭炮。本村的汉民去世也按照回民的规矩进行土葬^①。

① 本文访谈信息提供人：吕淑兰，女，60岁，东马各庄村妇联主任，访谈内容为“六月六”节及乡间的礼仪部分；吕树彬，男，78岁，东马各庄村人，访谈内容为农村的种地之道及冰雹老爷的故事；何如兴，男，60岁，于家务村村委会通讯员，访谈内容为回民礼仪及相关习俗。



第十一章



叠亡疏

从八通线终点站下来倒 801 路公交到于家务回族乡，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大耕堡村。附近村落的人们经常聚集在村口对着的立交桥下投下阴影的地里打麻将、扑克，聊家长里短。从大耕堡往南去首先路过的是东马各庄，村口有两排郁郁葱葱的大树，到了酷热的夏天也有一些老人到这树荫里纳凉。再往前走就是西马坊，而公路对面面积非常大的就是于家务回民村，远远就能瞅见于家务回族乡政府大院里高立着的红旗。接着到果村、东西堡。抄到东

边另一条道上再往南就是小海子村。这是我们眼见的普普通通的地理格局和风光，而在村民们的记忆里和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村落分布与世事人情自有另一番更富声色的说道。东马各庄的吕姓老爷子说起大耕堡的“黄仙儿”（黄鼠狼），讲它四处闹事无法无天，却唯独被一个姓韩的人给擒住了，因此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耕堡的韩八卦。”西马坊的一位大婶会背这么一句顺口溜儿：“西堡的高庙节节高，果村的塔尖向南勺，于家务的山景真好瞧，永乐店的狮子够不着。”于家务的何先生指着公路边各色花花绿绿的工厂和种植园招牌，回忆起在这些外地投资商进入的老早之前，从此处一直绵延到永乐店的大沙垡。小海子村的张老爷子谈起东西堡，说之前以“栲栳”这种盛具命名的这两个村，后来“栲栳”改叫“笆斗子”“柳罐”，再变化之后就无迹可寻了。需要提及的是本章包含的风俗民情，除了于家务回族乡的这几个村庄之外，还涉及台湖镇的台湖村和次渠村、永乐店镇的半截河和熬硝营、潮县镇的李辛庄，以及潞城镇的太子府等，可以说分布的点扩散到了近半个通州，但最初的因缘，的确是从于家务的西马坊村开始的。



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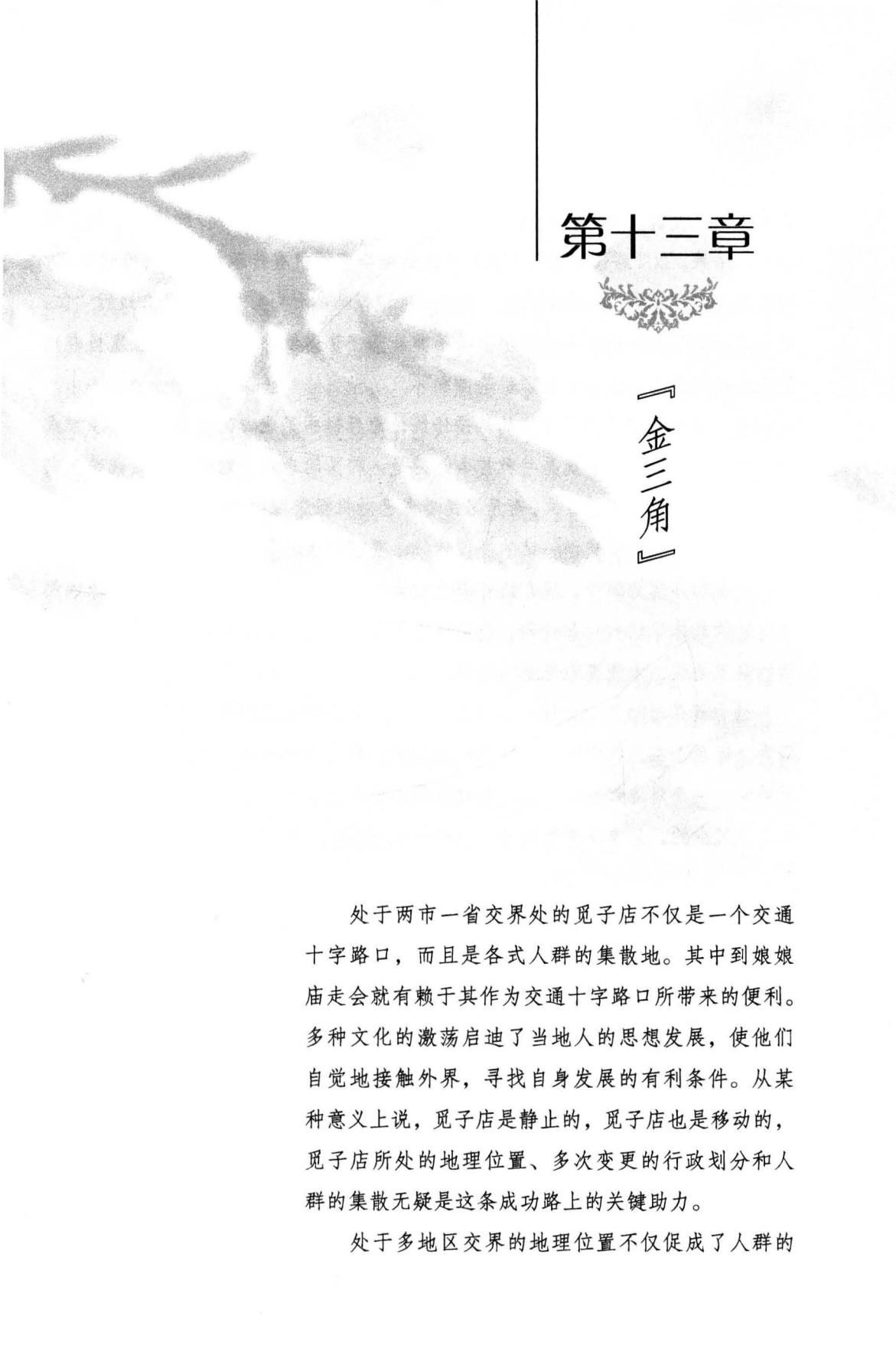


熬硝营

在向通州区永乐店的村民调查民俗文化时，和他们聊得多了，才发现原来在他们的生活记忆中，盐碱地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盐碱地没法种粮，但对各村的影响却大相径庭。盐碱地最严重的地方同时也是硝含量最多的地方，于是，熬硝营村便形成了熬硝盐的传统。盐碱地较为严重但硝含量又不够析出硝盐的地方，如半截河村，村民一度只能守着大片土地毫无办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大力整治盐碱地，半截河村村民才享受到土地带来

的丰腴。但即使盐碱地偏多的镇也并非每村都曾盐碱泛滥；相反，以大著称的德仁务村倒是比别村多了一个“大土坡”标志物。它独特的土质和出土的古物，给了历代村民许多遐想，也留下了他们祖辈的生活痕迹。

盐碱地孕育了熬硝传统，也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民俗文化。接下来，本章以熬硝营为题，以此带出永乐店镇的民俗传统，并凸显出民俗生成与土地之间的渊源。



第十三章



『金三角』

处于两市一省交界处的觅子店不仅是一个交通十字路口，而且是各式人群的集散地。其中到娘娘庙走会就有赖于其作为交通十字路口所带来的便利。多种文化的激荡启迪了当地人的思想发展，使他们自觉地接触外界，寻找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觅子店是静止的，觅子店也是移动的，觅子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多次变更的行政划分和人群的集散无疑是这条成功路上的关键助力。

处于多地区交界的地理位置不仅促成了人群的

聚集，而且使南、北方文化圈发生重叠、碰撞。李辛庄的修谱传统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以“耕读传家”为家族传统的李辛庄不仅有传承数百年的修谱习俗，而且有保存完整的《李氏家谱》；不仅有传道授业的私塾学堂，而且有践行“仁、义、礼、智”的李氏后人；不仅坚持不懈地坚守修谱传统，而且积极地发扬书法技艺。李辛庄是名副其实的“耕读传家”。

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南方的修谱传统，而且影响了北方的花会。从表演方式上，徐官屯的路灯老会既是一种花会，又是一种民间小戏。对当地民众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娱乐方式，而且寄托着自己对祖祖辈辈的感情和对神佛的敬畏。路灯老会在表演时要遵循一定的礼仪传统，要“讲古礼”，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神灵的惩罚和师傅的训斥。现在路灯老会作为徐官屯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既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村落认同，也正面临着传承危机。恐怕只有找到它与现实生活的真正关联，才能突破传承的瓶颈。

地方娱乐活动作为当地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仅记录着自身和外界的沟通历史，而且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劳作模式中。龙灯会走街串巷，为当地人求雨，更激发了民众对龙灯会的热情。龙灯会的传承需要当地人的坚守，但政府的扶持也是不可少的，只有二者相结合，龙灯会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

主要参考书目

1. [明]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卷三。
2. [明] 李东阳:《重修通州新城记》。
3. [明]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明崇祯八年刊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
4. [朝鲜] 李宜显:《燕行杂识》,点校:骈宇騫,1986年。
5. [朝鲜] 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
6. “艺术档案”, <http://www.artda.cn/view.php?tid=2331&cid=44>。
7. 《通州地理 004 期——走进台湖镇新河村寻访金口新河遗迹》,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8. 《通州地理 008 期——此河非彼河,半截河村发现大运河遗迹》,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9. 《通州地理 016 期——通州五河交汇处古代汇聚六条河》,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0. 《通州地理 009 期——隐藏在民居中的百年火车站》,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1. 《通州地理 011 期——京南重镇马驹桥:地名—桥名—地名的转化》,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2. 《通州地理 012 期——昔日享誉一方皇家码头今日北京最美乡村》,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3. 《通州地理 013 期——行走漕运古镇探寻通运桥、古城墙遗迹》,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4. 《通州地理 017 期——走进于家务寻访历史上的栲栳堡(kǎo lǎo fá)飞放泊》,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5. 《通州地理 018 期——历史上的台湖有台也有湖》，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6. 《通州地理 024 期——大运河孕育的古村庄》，载《通州时讯》，<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7. 《通州地理 026 期——于家务乡北辛店村的“岳家军”》，载《通州时讯》，
<http://www.tzxctz.com/Geology>。

18. 《通州建设史》，北京出版社。

19. 《通州时讯》，通州地理板块，第 22 期，2012 年 7 月 16 日，4 专版。

20.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档案编研材料之《行政村简介（1949—2007）》，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综合档案室，2007 年。

2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行政区划，<http://www.bjtzgh.gov.cn/n90/n168/n1617682/index.html>。

22.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编：《不能割断的记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23.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通州文化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年，第 56 页。

24. 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古韵通州》，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第 14 页。

25.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年，第 590 页。

26. 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载《中
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27. 金士坚、徐白等纂修：《通县志要》（民国三十年铅印本），北京：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 年。

28. 金士坚：《通县志要》，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2002 年。

29. 李金金：《宋庄集聚区：结束艺术家的飘荡》，载《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5 月 11 日第 049 版。

30. 李芊：《一支塔影，支柱幽燕，识认通州》，载《新京报》，2011 年 9

月1日。

31. 刘绍棠：《我和乡土文学》，载《刘绍棠文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32. 刘绍棠：《我是刘绍棠》，载《刘绍棠文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33. 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4. 秦瘦鸥：《戏迷自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35. 苏向东：《非遗故事：通州运河“十万八千壕”》，文化中国—中国网，cul.china.com.cn，2011-01-17。

36. 通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州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37. 王志红：《西马坊史话》，2010年，未刊。

38. 翟万增：《北五村》，未刊。

39. 翟万增：《马驹桥镇名胜古迹·碧霞元君祠及庙会》，未刊。

40. 翟万增：《西后街村仙晓老会论证报告》，未刊。

41. 翟万增：《小日本鬼子实行法西斯统治》，载《大事详说》，2007年6月9日，内部未刊。

42. 张宝田：《小海子村史》，未刊。

43. 赵晓楠：《民族音乐中的天主教音乐——贾后疃村天主教音乐会调查》，载《中国音乐》，1994年第3期。

44. 郑小江：《中国死亡文化大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45. 周良：《大运河头第一镇》，2012年，未刊。

46. 周良：《通州地名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

47.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通州文物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48. 孟宪良等：《通州运河文化》（共10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

49. 通州文化志编纂委员会：《通州文化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后 记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通州区卷》是在北京市文联立项的支持下，在北京民协、通州区文联的合作和通州区各乡镇政府的帮助下完成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专业的部分师生，作为承担这一志书写作任务的成员，谨向所有这些单位和负责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直以来对《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进行扶持和帮助。从2004年编写第一本《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以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直坚持对《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的立项，对各区县民俗文化志的编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各位领导也十分关心项目的进展，帮助协调、解决了我们在调查、编写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

通州区文联、通州区文化馆、通州区各乡镇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在《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通州区卷》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2012年7月，我们全体调查组成员开始进入通州区，开展田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通州区文联的各位领导积极帮助我们联系、安排食宿，联络各乡镇文化干部，为我们的调查和编写工作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为我们的调查和编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通州区文联领导，他们几乎每周都与我们通电话，或者见面沟通，以便及时了解我们的调查进展以及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全部都认真对待，积极帮助我们协调、解决。他们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在令我们感动。可以说，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保障了我们调查、编写工作的进度，也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通州区文化馆、文物所、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集中在2012年7月和8月进行，正是北京

最为炎热的季节，然而就是在这种恶劣的高温条件下，通州区各乡镇文化干部依然积极地陪同我们深入各个村落进行民俗文化摸底普查，积极帮助我们联络并陪同我们前往地方文化学者家里进行访谈。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少文化干部还亲自开车接送我们去村子里做调查。有些乡镇文化站站长或其他文化干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讲述人的线索，而且在我们的访谈中也一直陪同，甚至中午还要出资带我们吃午饭，并找地方让我们休息。他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不已。

在我们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通州区各乡镇的文化干部都是这样，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最宝贵的地方文史资料，还陪同我们一起到各个村落进行调查，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呈现，但他们对于我们的帮助，我们会一直谨记在心。

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访谈对象以及通州区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不仅是通州区民俗文化的拥有者，也是本书在叙事意义上的作者。在我们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通州区父老乡亲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同时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通州人民的包容、亲切，让我们感受到了通州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很多访谈对象都令我们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例如，我们在郭村进行有关“蹦蹦戏”田野调查时，退休教师翟万增先生，不仅慷慨地给我们提供了他所整理的相关材料，还积极主动地帮我们联络村子里蹦蹦戏剧团的相关人员，让我们的田野调查得以顺利进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翟万增先生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口头和文字材料。最后一次去调查时，他还将自己用蝇头小楷抄写的《马驹桥民俗文化史料》赠送给我们。这份信任和厚爱，让我们调查组成员十分感动。同时，在马驹桥调查“运河号子”时，在区文化干部常富尧先生的介绍下，我们到西后街李金普老先生家进行访谈。老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口头资料，最令我们动容的是，老爷子的家人在我们访谈时，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这让我们感动不已。

像翟万增老先生、李金普老先生一样的访谈对象还有很多，我们在调查和访谈过程中与他们建立起十分融洽的关系。对于项目组成员想了解的一切，他们都十分耐心地讲述出来，并在许多时候给我们提供他们自己视为“宝贝”的文献资

料。通州区人民热情好客、朴实可爱的性格在我们的田野访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和敬意，下面我们将把各章节所涉及的访谈对象及相关民俗话题进行说明：

在第二章关于“运河号子”的访谈中，通州区文化名人周良、郑建山、刘康达、赵庆福、常富尧等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过去运河漕运的相关故事，其中周良先生还为我们讲述了其童年时期的生活和劳作情况；“号儿王”赵庆福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过去运河拉纤的纤夫所喊“运河号子”的情况，并进行了示范，让我们能够更为立体鲜活地感受当年运河漕运的盛况以及“运河号子”的雄壮；梨园镇将军坟村张广生给我们讲述了关于过去种地的记忆；马驹桥镇西后街村李金普老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仙跷和夸号，并给我们现场表演过去行夸走碓的情形。

第三章，我们在对郭村“蹦蹦戏”进行田野调查时，邻村柴府村的退休教师翟万增老先生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他多年搜集的相关文本资料，还给我们讲述了他祖辈翟青山演唱单弦大鼓的故事；郭村“蹦蹦戏”传承人90岁高龄的杨永志老先生给我们回顾了过去六七十年中郭村“蹦蹦戏”的沉浮过程，并且凭记忆给我们复述了不少当时的唱段唱词，这些唱段唱词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很难寻觅了；现任郭村蹦蹦戏剧团团长的杨连喜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学戏经历以及带领村子里戏迷爱好者创立连喜评剧社的过程。

第四章是关于通州老街区“四大街”的民俗文化 with 民俗记忆的书写。刘天香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过去四大街老店铺的情形；居仁宝先生则给我们讲述了过去四大街的地摊买卖情况；李金祥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过去街面茶馆和剧场里听戏的情形；王丽女士给我们讲述了过去运河边上通州鞋厂的劳作情形以及鞋厂对于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影响等；马永才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十八个半截胡同的故事，以及通州区回民的传统生活；张金凤老人讲述了过去在十八个半截胡同艰难的生活情形；王文绪老人给我们讲述了通州区“三宝”（小楼饭店的烧鲶鱼、大顺斋的糖火烧以及万通酱菜和酱豆腐）的故事；张崇先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通州清真大寺的一些资料，并给我们讲述了传统的穆斯林节日与仪式习俗。

第五章，在关于潞河中学与通州文人的访谈中，周良先生给我们讲述了潞河中学与运河漕运的历史渊源；赵明生、刘康通、刘康达等先生回忆了当年在潞河

中学读书时的情形；作为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的弟弟，刘绍振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关刘绍棠先生的生活、学习以及创作经历的口述资料。刘绍棠先生的儿子刘松萝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刘绍棠先生生前的许多生活经历；儒林村党支部书记宋凤成先生也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刘绍棠先生交往的故事；通州文物专家周良先生则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生活史以及学习研究情况，为我们完成对于他个人生命史的写作提供了资料；刘康达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他个人的生活史，以及他们家族与潞河中学的几代情缘；运河音乐专家常富尧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史，以及他搜寻、整理“运河号子”、通州地区民间音乐的过程。

在第六章关于西集集市的访谈中，孟春贵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在当地流传颇广的李德春治病的故事，还给我们讲述了俗语“孤家王，要命的庞，婆婆娘娘四合堂”说法的由来。除了关于西集的民间故事外，孟春贵先生还给我们描述了过去西集集市的情形；胡介友老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过去西集上的“粮行、斗行、脚行与对子帮”的相关故事；高德海老人给我们讲述了过去传统邮局邮递信物的情形；在集市上，薛长河老人给我们讲述了编筐卖筐的经历；同样在集市上卖铁制农具的韩师傅给我们讲述了传统打铁的情形以及铁制农具的销售情况。

在第七章关于宋庄画家村的民俗志书写过程中，宋庄村村民任玉才给我们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挖河”的情形；蒋淑英、张淑华、王振山、王殿林、王钦伍、崔长浩、田香兰、郭健、老金等人给我们提供了宋庄画家村的日常生活资料；张士模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北寺教师村的历史及现在的发展状况。

第八章主要是关于贾后疃天主教、召里观音寺、兴各庄吹鼓手的民俗志撰写，贾万耕、贾希凤、贾思国等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贾后疃天主教堂的历史、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与仪式，家庭祈祷所及家庭聚会情形和天主教音乐的一些基本情况；张庆来、武德以及不具名的某佛教居士、某道士等给我们讲述了召里观音寺的一些情况以及过去运河上摆渡的情形；陈文保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兴各庄吹鼓手的日常生活与现状，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杨永兴给我们提供了东堡村高跷会的情况；张国良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六合村空竹制作以及表演的情况及相关文字资料。

第九章主要是关于通州“风车王”、里二泗小车会和木匠季连宝的民俗志写作，梁俊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并给我们讲述了其个人生活史以及风车的制作与表演等活动；韩德成先生及其妻子为我们提供了里二泗村小车会、佑民观及尹家河高跷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季连宝为我们提供了其个人的生活史，以及乡村木匠的现状，同时给我们讲述了关于佛教音乐中的“北韵”和当地“正月初六不出门”的民俗情形及文化内涵。

在第十章有关“六月六”节的调查访谈中，吕淑兰女士、吕树彬先生、何如兴先生等分别给我们讲述了“六月六”节及乡间礼仪的内容、传统农业的种植情况以及回民礼仪及相关习俗等。

第十一章主要是关于通州农村地区丧葬习俗以及上坟扫墓习俗中的“叠亡疏”的民俗志撰写，在相关资料访谈中，西马坊村村民王志红给我们提供了尚未正式出版的《西马坊史话》资料；郝胜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老道会及丧葬习俗上叠亡疏的一些情况；王清、吕淑兰、魏洪生等人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民间祭祀的一些资料；小海子村张宝田老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其自己编撰尚未正式出版的《小海子村史》，并热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史，小海子村的堂号、点主与堂祭等问题及其编撰村史的过程；张怀普先生等人给我们讲述了丧葬习俗中“点笙钱”的基本情况以及半截河老道会的一些情况；某张姓老人、张清先生等给我们讲述了当地次渠一带关于“大仙爷”“二仙爷”的信仰问题。

第十二章主要是关于熬硝营的熬硝传统、德仁务晾鹰台以及半截河的老道会的民俗志撰写。在资料访谈中，魏洪生等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熬硝营村的熬硝传统以及熬硝工艺制作过程等；董学林、张孝宽两位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德仁务晾鹰台的故事以及村落的基本资料；半截河村张怀普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半截河老道会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以及半截河“雁过拔毛”说法的由来和老道会的基本组织情况等内容。

第十三章主要是关于觅子店“金三角”工贸城、李辛庄李氏家族、徐官屯路灯老会、张庄龙灯会的民俗志撰写。在资料访谈中，觅子店杨老爷子给我们讲述了过去“娘娘庙走会”的情形；南屯村人廉先生、觅子店村刘先生等人给我们提供了觅子店“金三角”工贸城的兴起过程，以及发展现状等相关资料；李辛庄李

恩骏老先生给我们讲述了李辛庄村李氏家族的基本情况，同时给我们回忆了过去李辛庄私塾学堂的情形。除此之外，李恩骏老先生还给我们讲述了其于1996—1998年间撰修《李氏族谱》的过程，慷慨地让我们查阅翻拍族谱的相关内容，并赠送给我们《李氏家法八条》《学僖家训》等相关文献资料；徐官屯徐学田老先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徐官屯路灯老会的材料，给我们讲述了路灯老会的组织、角色以及表演过程等内容，同时给我们讲述了路灯老会的规矩，比如“三参篱笆”等活动；张庄村谢文龙老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张庄龙灯会的基本资料，他给我们讲述了张庄与上、下八村的关系及历史渊源，同时给我们讲解了龙灯会中“方口蓝龙”的制作及表演情形，他还给我们讲述了过去求雨的仪式活动以及龙灯会道具的存放问题。

除了以上具了名姓的通州区人民之外，还有许多不愿意透露名姓的村民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在这里我们一并致以最崇高的谢意。

在通州地区进行的民俗调查与民俗文化志写作，对于编写组每一位参与者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锻炼。这本沉甸甸的通州区民俗文化志的撰写能够顺利完成，是通州地区文化部门相关领导、学者、通州地区朴实可爱的人民以及项目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如何，这都将成为项目组每一位成员铭刻终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是为后记。

刘铁梁

2016年9月

